

海派经济学

程恩富 顾海良 主编

丁晓钦

—— 保罗·克鲁格曼：凯恩斯经济学的「回归派」

—— 访经济学家方兴起

胡乐明

—— 孙秋鹏 王佳菲 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沿海地区外经外贸的冲击与应对研究

—— 以宁波为例

杨承训

—— 论当代资本主义矛盾的阶段性特征

—— 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根源及其启示

朱富强

—— 诺贝尔经济学奖和克拉克奖的得主盛名难副

—— 从一份伟大经济学家的排名表谈起

杨虎涛

—— 马克思经济学与奥地利学派

—— 能否以及如何实现演化分析的综合

陆夏

—— 汪文祺 国际垄断条件下剩余价值转移模型初

—— 马一飞 价值转型理论的研究路径及创新方

胡靖春

—— 论马克思工资理论的当代意义

陈弘

—— 收入分配差距若干理论问题研究

张峰

—— 补偿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分析

汪林海

—— 马克思地租理论的创新及在房价理论中的应用

王朝科

—— 论马克思的自然力思想

刘凤义

—— 胡钧的学术贡献和经济思想

黄娟

—— 胡乐明 新养老保障理论与政策

——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智库第二届高层论坛综述

海派经济学

程恩富 顾海良 主编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派经济学. 第 29 辑. /程恩富,顾海良主编.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 3

ISBN 978-7-5642-0821-9/F · 0821

I. ①海… II. ①程… ②顾… III. ①经济学—丛刊 IV. ①F0-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40094 号

- 特约编辑 徐永禄
- 封面设计 周卫民

HAIPAI JINGJIXUE

海派经济学

程恩富 顾海良 主编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武东路 321 号乙 邮编 200434)

网 址: <http://www.sufep.com>

电子邮箱: webmaster@sufep.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

上海远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装订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787mm×1092mm 1/16 11 印张 214 千字

印数: 0 001—1 500 定价: 23.00 元

目 录

专 访

- 保罗·克鲁格曼:凯恩斯经济学的“回归派”
——访经济学家方兴起 丁晓钦(1)

论 文

- 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沿海地区外经外贸的冲击与应对研究
——以宁波为例 胡乐明 孙秋鹏 王佳菲(11)
- 论当代资本主义矛盾的阶段性特征
——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根源及其启示 杨承训(23)
- 诺贝尔经济学奖和克拉克奖的得主盛名难副
——从一份伟大经济学家的排名表谈起 朱富强(35)
- 马克思经济学与奥地利学派
——能否以及如何实现演化分析的综合 杨虎涛(46)
- 国际垄断条件下剩余价值转移模型初探 陆 夏 汪文祺(57)
- 价值转形理论的研究路径及创新方向 严金强 马一飞(68)
- 论马克思工资理论的当代意义 胡靖春(85)
- 收入分配差距若干理论问题研究 陈 弘(96)
- 补偿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分析 张 峰(105)
- 马克思地租理论的创新及在房价理论中的应用 汪林海(114)
- 论马克思的自然力思想 王朝科(134)

人 物

- 胡钧的学术贡献和经济思想 刘凤义(150)

综 述

- 新养老保障理论与政策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智库第二届高层论坛综述 ... 黄 娟 胡乐明(161)

CONTENTS

Interview

- Paul Krugman: the Returner of Keynesian Economics
—An Interview with Economist Fang Xing-qi Ding Xiao-qin(1)

Paper

-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s Big Impact on Foreign Trade in Coastal Area of China and our Countermeasures
—Taking Ningbo City as an Example Hu Le-ming Sun Qiu-peng Wang Jia-fei(11)
- On the Phased Features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t Contradictions
—the Deep Cause and its Revelation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Yang Cheng-xun(23)
- Winners of Nobel Prize and John Bates Clark Medal are Actually Unworthy of Their Reputation
—Speaking of a Ranking List of Great Economists Zhu Fu-qiang(35)
- Marx's Economics and the Austrian School
—Whether and How to Achieve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Evolution Yang Hu-tao(46)
- Preliminary Explorations on Transfer Model of Surplus Value under International Monopoly
..... Lu Xia Wang Wen-qi(57)
- The Research Approaches and Innovation Direction of Value Transformation Problem
..... Yan Jin-qiang Ma Yi-fei(68)
- On the Contemporary Meaning of Marx's Wage Theory Hu Jing-chun(85)
- Arguments on Some Academic Viewpoints on Gap of Income Distribution Chen Hong(96)
- Economic Analysis of Compens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Zhang Feng(105)
- Innovation of Marx's Land Rent Theory and Its Application in Urban House Price Model
..... Wang Lin-hai(114)
- A Study on Marx's Theory of Natural Forces Wang Chao-ke(134)

People

- Academic Contribution and Economic Thought of Professor Hu Jun Liu Feng-yi(150)

Overview

- New Theories and Policies on Old Age Security
—Overview of Second High-level Forum of Think Tank for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 Huang Juan Hu Le-ming(161)

保罗·克鲁格曼：凯恩斯经济学的“回归派” ——访经济学家方兴起^①

丁晓钦

内容提要 克鲁格曼既不是老凯恩斯主义者，也不是新凯恩斯主义者，而是属于“凯恩斯经济学的回归派”。就整体而言，同凯恩斯经济学一样，克鲁格曼的理论体系具有二重性质，即它是一个正确与谬误，科学探讨与诡辩献媚的混合物。在衰落的大英帝国与崛起的美国之间的利益冲突中，凯恩斯是站在大英帝国一边的。同凯恩斯相似，克鲁格曼在和平发展的中国与霸权衰落的美国间的利益冲突中，是站在美国一边的，即使这种行为与他的理论相矛盾也在所不惜。

关键词 “回归派”二重性 国家利益

丁晓钦（以下简称丁）：自克鲁格曼于 2008 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特别是克鲁格曼于 2009 年 5 月访问中国之后，国内对克鲁格曼的言论的评论日益增多。方教授自 1997 年就开始研究克鲁格曼的理论和政策主张，不知您如何看待克鲁格曼及其理论体系？

方兴起（以下简称方）：我以为，要想正确地评价克鲁格曼及其理论体系，首先必须弄清克鲁格曼理论的思想渊源。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凯恩斯经济学对克鲁格曼的影响最大。因此，有的人认为克鲁格曼是一位新凯恩斯主义者。其实不然。在当今的西方学术界，与新凯恩斯主义者相比，克鲁格曼更接近于老凯恩斯主义者，因为新凯恩斯主义者将凯恩斯的宏观分析微观化了，而克鲁格曼和老凯恩斯主义者都坚持凯恩斯的宏观分析方法。但与老凯恩斯主义者相比，克鲁格曼更接近凯恩斯，因为老凯恩斯主义者忽略了凯恩斯理论赖以成立的前提条件，即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确切地说，处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居于支配地位的时期，克鲁格曼基于现实经济情况和经济问题，将凯恩斯反对传统的自由放任和主张国家干预的理论发展成为一种既有别于老凯恩斯主义，又有别于新凯恩斯主义的全新的理论体系。基于这样一种思想路径的还有乔治·索罗斯等人。我将他们称之为“凯恩斯经济学的回归派”，从而将他

收稿日期：2010-1-20

作者简介：丁晓钦（1977-），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① 方兴起（1950-），经济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导；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

们与老凯恩斯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区别开来。实际上,克鲁格曼公开承认:“我不仅认为我们处在一个新的萧条经济学的时代,我还认为,洞察了‘大萧条’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在现在的意义要比在以往任何时候都大”。^①

就整体而言,同凯恩斯经济学一样,克鲁格曼的理论体系具有二重性质,即它既存在严重的理论错误和辩护性质,又具有科学成分。换句话说,克鲁格曼理论体系是一个正确与谬误,科学探讨与诡辩献媚的混合体。

丁:可否对克鲁格曼理论体系的二重性质,做些具体分析?

方:可以。值得肯定的是,克鲁格曼在理论上的创新都源自对新自由主义的否定。就像 20 世纪 30 年代“凯恩斯革命”源自对传统自由放任学说的否定一样,克鲁格曼在贸易、汇率、地理,以及金融危机等方面所做出的理论贡献,都与反新自由主义相关。正是认识到建立在理想化模型之上的古典自由贸易理论已不再适合现实的世界贸易,克鲁格曼才能够提出新的贸易理论,即用规模经济、学习曲线和动态创新来分析当今世界贸易的复杂性,特别是分析“即使国与国之间并不存在资源或技术上的差异,规模经济仍促使各国追求生产的专业化和贸易”。^② 并且,基于新贸易理论提出了新的贸易政策主张,即通过政府经济政策使国家获得最大份额的“租”和“外部经济”。正是突破主流的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的分析方法,克鲁格曼才能利用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分析方法创建新的经济地理学或新的生产的空间区位理论。正是突破米尔顿·弗里德曼关于汇率市场会自发趋于稳定的观点,克鲁格曼认为汇率的不稳定性,决定了不能完全由市场决定汇率,从而提出可调整的钉住汇率体制。正是挑战“华盛顿共识”,克鲁格曼在研究金融危机时才能够将注意力从一国国内因素,转向国际因素。值得指出的是,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克鲁格曼看到了美国所面临的需求不足和严重的贫富分化问题,但是,他并未将需求不足和贫富分化与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联系起来。而是将需求不足和贫富分化与美国共和党政府联系起来,并将解决这方面问题的希望寄托于奥巴马的民主党政府。更值得注意的是,克鲁格曼将 20 世纪 30 年代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产生的凯恩斯需求不足理论,直接用来说明 1997~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和 2007~2009 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显然缺乏唯物史观。从而仅仅看到需求不足是 1997~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和 2007~2009 年全球性金融危机与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的惊人的相似之处,却看不到两者因历史环境的变迁而存在的惊人的不同之处。正因如此,克鲁格曼难以对美国实体性需求不足与虚拟性需求过剩并存的现实给予科学的解释。^③

丁:克鲁格曼理论体系的二重性还体现在哪些方面?

① 克鲁格曼. 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和 2008 年经济危机[M]. 刘波译. 中信出版社,2009,192.

② 克鲁格曼. 国际经济学[M]. 海闻等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145.

③ 详见方兴起. 保罗·克鲁格曼:反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创新[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4).

方：从阶级关系来看，在西方经济学家中，克鲁格曼是为数不多的平民阶层的代言人。他的“劫富济贫”的主张，与新保守主义经济学家的“劫贫济富”的主张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由于遭到富豪阶层的仇恨（他也“欢迎他们的仇恨”），克鲁格曼的理论在西方社会长期处于非主流地位。相反，空洞无物的新保守主义经济学如果不是得到富豪的赞赏，是根本不可能在西方社会处于主流地位的。不过，克鲁格曼对美国的民主党所抱有的政治幻想是显而易见的。在他眼里，民主党代表着占美国人口大多数的中下层利益，而共和党则代表着占美国人口极少数的富人的利益。其实，在阶级的视角下，民主党与共和党都代表着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么，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下，民主党和共和党分别代表垄断资产阶级中的不同阶层的利益。为了维护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民主党和共和党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安抚社会中下层人民。正如克鲁格曼所说的，“早在 1881 年，俾斯麦便描述了一套我们今天称之为福利国家体制的基本原理。在他看来，可用这套体制来安抚社会下层，巩固德皇的统治”。^① 在笔者看来，无论任何政治派别，只要采取有利于社会中下层人民利益的政策，我们都应表示欢迎，但我们必须对这种政策所要达到的阶级目的保持清醒的头脑。在阶级社会中，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法，是研究社会现象所不可或缺的科学方法，否则，像克鲁格曼那样产生政治幻想是难以避免的。

由于克鲁格曼不加限制地强调政治对经济的决定作用，而完全忽视了政治最终决定于经济（特别是阶级间的经济关系），他虽然对美国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作了深入的分析，却难以将贫富两极分化与需求不足联系起来，进而分析需求不足的原因。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同凯恩斯一样，克鲁格曼认为问题并不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而是出在自由放任学说。由此，也就堵塞了他对问题的正确认识。也就是说，克鲁格曼只能看到自由派与保守派在“新政”和“反新政”上的较量，却完全看不到资本主义私有制意味着占美国人口极少数的富人或资产阶级垄断了生产资料和产品，从而占有了绝大部分的社会财富，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下层人民被排挤在生产资料和产品占有之外，从而占有极少部分的社会财富。这必然陷入“生产者没有什么可以消费是因为缺乏消费者这种荒谬的矛盾”之中。^② 在美国当前的经济条件下，这种荒谬的矛盾必然导致需求不足与“需求过剩”并存于美国社会。

阶级的局限性，使克鲁格曼将美国当前危机的出路完全寄托于奥巴马向“新政”的回归。殊不知，“生产资料的扩张力撑破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加给它的桎梏。把生产资料从这种桎梏下解放出来，是生产力不断地加速发展的

① 克鲁格曼·美国怎么了？[M]。刘波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24。

②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32。

唯一先决条件,因而也是生产本身实际上无限增长的唯一先决条件。但是还不止于此。生产资料由社会占有,不仅会消除生产的现存的人为障碍,而且还会消除生产力和产品的有形的浪费和破坏,这种浪费和破坏在目前是生产的无法摆脱的伴侣,并且在危机时期达到顶点”。^①

丁:自2009年5月以来,克鲁格曼对中国政府不公允的批评,实在有失一个学者的身份。对此,您有何评论?

方:克鲁格曼对中国政府所持的态度,正好是其理论体系二重性的具体的、现实的体现。您知道,在衰落的大英帝国与崛起的美国之间的利益冲突中,凯恩斯是站在大英帝国一边的。同凯恩斯相似,克鲁格曼在和平发展的中国与霸权衰落的美国间的利益冲突中,是站在美国一边的,即使这种行为与他的理论相矛盾也在所不惜。

套用马克思的话说,我绝不用玫瑰色描绘克鲁格曼的面貌。不过在这里只是将其视为“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②因此,对于克鲁格曼自2009年5月以来对中国的种种指责或攻击,并不感到意外。在对克鲁格曼责难中国的言论愤怒不已的群体中,有相当一些善良的人对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怀有不切实际的愿望。实际上,在如何客观地看待中美关系的问题上,克鲁格曼远不及斯蒂格利茨、蒙代尔和麦金农,甚至连索罗斯都不如。当然,这绝不意味着我对克鲁格曼攻击中国的言论会无动于衷,因为,即使基于克鲁格曼的理论来看,克鲁格曼在中国期间(2009年5月)攻击中国的言论也是站不住脚的。具体来说:

1. 在国际货币体系的问题上,克鲁格曼认为,“我们并没有一个真正的国际货币体系”,因此,“没有人要求你以美元方式建立你的外汇储备,还有欧元、日元可以选择”。在我看来,说当今“没有一个真正的国际货币体系”,没错。当今确实没有一个基于各国达成协议,类似布雷顿森林体系那样的国际货币体系。但是,克鲁格曼只是说对了问题的一半。实际上,当今存在着一个美元霸权支配下的国际货币体系。我将其称为“没有体系的体系”。

具体来说,布雷顿森林体系在1971年的崩溃,标志着美国进入了其霸权的衰落期。从此,美元虽不再是唯一的视同黄金,甚至比黄金还要好的国际储备货币,却是不受黄金约束的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这意味着,美国政府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发行美元,即使就美国国内而言,美元的发行是超经济的,但只要能通过经常项目赤字吸收全球资源,美元的超经济发行仍然可以满足马克思的“货币是商品奴仆”的铁律。当然,就全球而言,美国持续的经常项目赤字导致大量流入各国的美元,不能通过正常的国际贸易渠道回流美国,美元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 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32~633.

^② 马克思说:“我绝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资本论[M]. 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2.

就会像英镑一样丧失霸权地位。因为世界各国基于其自身的利益，绝对不会长期容忍美元的掠夺。但是，美国凭借其独大的军事实力，并辅之以美国国债渠道回流各国政府持有的美元，形成一种以美元与美国超强的军事实力互为基础的、非经济的、反市场原则的货币本位，即“美元—武力”本位来支撑美元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中心地位。从而，成功地使美元的超经济发行具有了可控性和可持续性。另外，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由于真正的世界货币（超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缺位，任何一国的货币又难以取代美元，而先后实现国际化的联邦德国马克、日元和欧元都成为霸权衰落的美国转嫁其经济与金融问题的首选目标。因此，各国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各国之间的经济关系还不得不以美元为主要的纽带。这样，世界各国接受“美元—武力本位”制，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实属无奈。20 世纪 60 年代一些发达国家无奈地持有大量难以兑换黄金的美元储备，70 年代以来一些石油输出国无奈地持有巨额的只能购买美国国债的美元储备，在新的世纪，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包括中国在内）无奈地持有大量的只能购买美国国债的美元储备。

作为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对这些情况不可能不清楚。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他竟然对中国人说，“没有人要求你以美元方式建立你的外汇储备，还有欧元、日元可以选择”。但是“为什么中国不这样做呢？这要问中国储备银行的官员”。其弦外之音是，既然中国的中央银行自愿选择美元来建立外汇储备，就必须自担相应的风险。因此，“从中国的角度来看，美国必须保护中国不要因为美元的贬值而造成损失，这个不是美国做出的承诺”，“这么要求美国是不对的”。然而，曾几何时，就是同一个克鲁格曼却谴责了美国的这种不承诺。他在分析国际货币体系如何失灵的问题时，认为“美国就是利用天真地忽略美元汇率波动影响的政策来为自己服务的。当美元对日元汇率、美元对欧元汇率在不停地折腾时，这种烦恼对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只是小事一桩，它不需要为美元汇率稳定做出任何承诺，在衰退或金融危机来临时，它只需要将自己的精力放在迅速地、大幅度地降低利率上”。^① 克鲁格曼这种自相矛盾的言论，只能从作为理论家的克鲁格曼与作为美帝国主义全球战略的代言人的克鲁格曼这种人格分裂中去寻找答案。

2. 在国际贸易方面，克鲁格曼认为，“中国这么大的贸易顺差不完全是比较优势造成的，跟中国的政策有直接关系”，“这是政策的结果，不是市场自然的结果”。克鲁格曼对中国的这种指责，与他曾经批判过的传统自由贸易理论如出一辙，而与他的新贸易理论背道而驰。

具体来说，在克鲁格曼看来，“传统的支持自由贸易的观点部分地是建立

^① 克鲁格曼·萧条经济学的回归[M]. 朱文晖等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50～151.

在理想化的理论模型之上的,在该模型中,自由贸易可以被证明是最有效的”,“如果抛弃了这些理论中的某些理想化的假设,市场有效的结论就值得怀疑了”;另外,“传统的对市场有效率的信念,部分地反映了人们对现实的判断,但它也同样反映了人们还不具备精确地描述偏离完全市场会发生什么情况的能力。”克鲁格曼认为,贸易特征的变化和经济理论的深入发展,使人们再也不能基于市场有效的假说为自由贸易辩护了。因为,“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占世界贸易大部分的产业根本不能用供需分析来描述,供需分析认为,让市场自行其是是最好不过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相当一部分贸易需要用规模经济、学习曲线和动态创新来解释,而这些现象都与自由贸易是最好的政策这一结论的理想化假设不相容。经济学家们把这些现象定义为‘市场不完全’……在现实中,这种市场不完善很可能是普遍情况,而不仅仅是例外”;“另一方面,分析工具的日趋改进,至少使一部分坚持完全市场假设的原因不能成立。15年前,经济学家还可以,也确实声称他们对不完全竞争在国际贸易中的政策含义知之甚少,几乎说不出所以然来”。^①但对贸易政策基础的重新思考,形成了新的认识,从而提出了比自由贸易更能使一国受益的两种贸易政策:一种是通过政府政策使国家获得较大份额的“租”。“租”在经济学中是指“某种要素所得到的高于该要素用于其他用途所获得的收益”,即超额利润;贸易的这一新思路意味着,重要的贸易部门就应是那些租不会轻易因竞争而消失的部门,“如果存在大规模生产的优势,比较陡的学习曲线,即使该产业中现有的企业能获得高额利润,支付高工资,或两者兼而有之,新进入的企业也难保证有利可图”。另一种贸易政策是通过政府政策使国家获得更多的“外部经济”。“经济学家所称的‘外部经济’,是指一些个人或厂商从其他从事某种经济活动的个人或厂商那里获得的收益”,如某一领域产生的知识扩散到其他厂商和部门。克鲁格曼认为,外部之所以成为一个贸易问题,是因为在对贸易的重新评估中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由于涉及到产生知识,技术革新很可能产生有益的外溢,因此,贸易政策可以被用来扶持能够产生外部经济的活动。克鲁格曼认为,所有这些都说明,极端支持自由贸易的观点——即市场已运作得非常好,不可能再对它做任何改进了——是站不住脚的。

之所以克鲁格曼对中国的指责与其新贸易理论及其政策主张相矛盾,完全在于克鲁格曼在国家间的贸易关系上采取双重标准,即美国可以用贸易政策来扶持能够产生外部经济的活动。如果外国政府对这类活动采取支持和保护的政策,就“可能使我们丧失这些有益的技术外溢,因此我们应予以反击。

^① 克鲁格曼. 战略性贸易政策与新国际经济学[M]. 海闻等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22, 16~17, 17.

这与认为无论外国政府采取何种举动本国实行自由贸易都是合理的传统观点是背道而驰的。”^①

3. 在人民币汇率方面,克鲁格曼认为,“中国相对固定的汇率政策导致了外汇的大量地积累”。在美国,“每年财政部必须要确定中国是否操纵其货币汇率,每年财政部总是说谎,说中国没有对其汇率进行操纵”。显然,在克鲁格曼看来,中国在操控人民币汇率而没有将其交给外汇市场是确定无疑的。但是,克鲁格曼的这一看法与其《萧条经济学的回归》(1999)一书的观点格格不入。在该书中,克鲁格曼说:“在我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中,我相信自由的浮动汇率是我们所能获得的最好的体制”,“我现在已经改变了主意。据我对浮动汇率实际运作情况的了解,我现在支持最终回归一种可以相机调整、多少比较固定的汇率体制”。“我之所以改变主意是因为看到了下面两点。首先,汇率与贸易的隔离……似乎是汇率波动的一个结果,它是反对允许这种波动频繁发生的一个理由。”其次,“金融市场不值得信赖。它们可以使汇率远离合理的水平,并在这个过程中造成实际的伤害”,因此,“我认为汇率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价格,不能完全将它们交给外汇市场”。^② 中国现行的汇率政策,实际上就是克鲁格曼所主张的那种“可以相机调整、多少比较固定的汇率体制”。实践证明,中国现行的汇率政策不仅有利于本国,而且有利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这样一个行之有效的人民币汇率体制,为什么要放弃转而将人民币汇率交由连克鲁格曼都不相信的外汇市场去决定呢?客观地说,是美国政府在操纵美元汇率,并通过美元的霸权地位操纵各国的货币汇率。而现行的人民币汇率体制,恰恰是一种有效的反霸权操纵的制度。我相信我国政府是不会屈服于美国的压力而改变现行的汇率政策的。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心虚的美国政府不敢玩贼喊捉贼的游戏,而克鲁格曼却说了美国政府想说而又不敢说的话,只能表明克鲁格曼为了维护一个衰落的霸主国的利益,而放弃了一个学者的良知。

4. 克鲁格曼认为,“我们是来自于中国的钱来帮助我们买了这个房子,然后再卖了房子赚钱,这是带来经济危机的赚钱方式”。这实际上是在暗示,美国当前金融与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中国。另外,克鲁格曼认为,从“全球来看,很难实现真正的恢复,有很多的经济体一直维持很大的贸易盈余,主要是发展中国家,主要就是中国”,从而“盈余的国家成为麻烦制造者,而不是带给别人好处”。这意味着,中国不仅是当前金融与经济危机的根源,而且成为阻碍全球经济恢复的“麻烦制造者”。但是,向美国购房者放贷的是美国的金融机构而不是中国的金融机构,即使因此而引发经济危机,与中国何干?号称全

^① 克鲁格曼. 战略性贸易政策与新国际经济学[M]. 海闻等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18, 19, 20.

^② 克鲁格曼. 汇率的不稳定性[M]. 张兆杰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95, 95~96.

球第一大经济体的美国,却必需依靠大量进口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商品才能养活本国的人民。而为了满足美国的需要,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出口到美国的是价廉物美的商品,得到的则是不断贬值的美元,究竟谁是“麻烦制造者”?将本国的问题归咎于他国,往往是衰落霸主国的臣民所特有的一种没落心态。不幸的是,作为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的克鲁格曼也以这样的心态看待中国,真是有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身份。这里权且借用克鲁格曼的话说,克鲁格曼“应该以开放的态度来分析问题”。因为,正是持开放的态度,克鲁格曼从亚洲金融危机及全球的金融动荡中,敏锐地看到了1997~1998年金融危机和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与“30年代的大萧条”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即都是根源于“世界需求不足”和“自由市场政策”。如果克鲁格曼持更加开放的态度,以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那么,他一定同意程恩富教授的观点:“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全球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与马克思和列宁时代相比,当今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是经济不断社会化和全球化,与生产要素的私人所有、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的矛盾,与国民经济的无政府状态或无秩序状态的矛盾。”^①基于这样的观点来观察全球,克鲁格曼是绝对不会犯上述的一些常识性的错误的。

丁:不难看出,在国家间的关系上,克鲁格曼实际上充当了美国垄断资产阶级辩护士。当然,不能因人废言。就理论而言,如何看待克鲁格曼理论的历史地位呢?

方: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回顾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第一、二次理论危机的历史过程,有利于我们观察当前陷入理论危机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及其发展趋势。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第一次理论危机中,1929~1933年的大萧条导致主张自由放任的新古典经济学陷入了理论危机,而美国等西方国家政府由放任经济的政策转向高强度干预经济的政策,导致凯恩斯经济学取代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主流地位。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第二次理论危机中,1973~1975年的严重滞涨问题,导致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陷入了理论危机,而英国和美国的政府由于干预经济的政策转向高强度的推行自由放任的政策,导致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取代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主流地位。这足以表明,西方主流经济学曾发生的两次理论危机都是由重大的经济与政治事件引发的。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西方国家政府在处理重大经济事件中,经济政策的反向调整,往往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与非主流经济学易位的直接原因。基于这点则不难看到,2007~2009年全球性金融与经济危机导致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陷入了理论危机,而以美国为首的一些主要国家由放任经济的政策转向高强度的干预经济的政策,必将导致主张国家干预的经济学取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① 程恩富. 当前西方金融和经济危机与全球治理[J]. 管理学报, 2009(1).

基于上述认识,我认为“回归凯恩斯论”(凯恩斯的萧条经济学将从经济分析的边缘走向中心),表明克鲁格曼清晰地看到了陷入理论危机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趋势,即主张国家干预的经济学必将取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主流地位。无论瑞典皇家科学院主观意愿如何,将 2008 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当今的非主流经济学家克鲁格曼,都将在客观上预示着西方主流经济学与非主流经济学的易位,即国家干预理论将取代市场原教旨主义理论。值得一提的是,我国有的学者认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乔治·A. 阿克洛夫的《宏观经济学中缺失的动机》(2007)一文,系统地反击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从而有可能颠覆其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霸主地位,并预示着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复兴。^①笔者认为,西方主流与非主流经济学的易位,取决于重大的经济与政治事件,而绝不取决于某人提出了新的理论。正如当年凯恩斯提出的萧条经济学并不比卡莱茨基早,更晚于维克塞尔,但历史却将凯恩斯理论推向西方经济学发展的“拐点”一样,当前百年一遇的金融大海啸和奥巴马政府经济政策的逆向调整,已将克鲁格曼理论,而不是阿克洛夫理论推向了西方经济学发展的“拐点”。更何况克鲁格曼的“回归凯恩斯论”早于阿克洛夫的理论 10 年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三次理论危机呈现出国家干预理论与自由放任理论的周期性的更替和复归。如在西方经济学的第一次理论危机中,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取代新古典的自由放任理论的主流地位,向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理论复归;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第二次理论危机中,主张自由放任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取代主张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主流地位,向新古典的自由放任理论复归;在当前的第三次理论危机中,种种迹象显示,国家干预理论必将取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主流地位,向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复归。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因历史环境的相似性,往往会出现理论的“复归现象”或“回归现象”,但是,这种理论的复归现象又因经济与政治条件的变化而不可能是经济理论史上的简单重复。具备西方经济思想史常识的人,是不会认为向重商主义复归的凯恩斯理论是对前者的简单重复;也不会认为向古典经济学复归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对前者的简单重复。

^① 关于阿克洛夫的新观点详见:Akerlof, George A, The Missing Motivation in Macroeconomic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7, Vol. 97, issue 1, pages 5-36.

Paul Krugman: the Returner of Keynesian Economics

—An Interview with Economics Fang Xing-qi

Ding Xiao-qin

Abstract Paul Krugman is neither old Keynesianist, nor new Keynesianist, but the returner of Keynesian Economics. As a whole, similar to Keynesian economics, the economic system of Krugman is of dual characters, that is, it is both right and wrong, and is a mix of scientific exploration and sophistic flatter. During 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 declining Great Britain and the rising USA, Keynes stood at the side of Great Britain. Similarly, Krugman is now standing at the side of USA during 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 developing China and the hegemony-waning USA in spite of the paradox existing between his behavior and his theory.

Key words the returner duality national interests

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沿海地区 外经外贸的冲击与应对研究 ——以宁波为例

胡乐明 孙秋鹏 王佳菲

内容提要 国际金融危机给中国沿海地区外经外贸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作为沿海开放省市代表的宁波,其外经外贸在遭受冲击和应对冲击两个方面都具有典型意义。通过对宁波外经外贸遭受危机冲击的情况、原因以及相关应对举措进行分析,可以获得有益于中国外经外贸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借鉴和启示。

关键词 国际金融危机 外经外贸 转变对外发展方式

一、国际金融危机对宁波外经外贸的冲击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中国加入 WTO 之后,宁波外经外贸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外贸进出口总额 2002 年为 120.7 亿美元,超过 100 亿美元大关;2004 年为 261 亿美元,超过 200 亿美元大关;2005 年为 334 亿美元,超过 300 亿美元大关;2006 年为 422 亿美元,超过 400 亿美元大关;2007 年达 565 亿美元,超过 500 亿美元大关;2008 年达 678.4 亿美元,超过 600 亿美元大关。2008 年,宁波进出口、出口、进口规模分别处于全国 36 个省、市、自治区和计划单列市的第 11 位、第 9 位和第 11 位;人均外贸额超过 1 万美元,相当于全国人均水平的 6 倍左右;外贸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分别为 118.9% 和 81.2%,分别高于全国 59.7 和 48.2 个百分点,高于浙江省 50.6 和 31.1 个百分点。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宁波进出口贸易受到重大冲击,出现了大幅下滑。2008 年 7 月,宁波进出口总额环比开始出现下降,且日趋恶化,11 月份出现同比-13.1% 和环比-21.95% 的下滑。进入 2009 年,宁波进出口 2 月份同比增长率为-29%,为同比下降最严重月份,环比下降幅度也高达

收稿日期:2010-2-20

作者简介:胡乐明(1965-),山东烟台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原理部主任(副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

孙秋鹏(1976-),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王佳菲,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30.51%。2009年8月份之前,宁波进出口各月同比数据均呈现两位数的负增长,3~7月份增长率分别为-17.1%、-23.4%、-23.3%、-16.9%和-16.2%。

与全国、浙江省进出口受到金融危机冲击情况相比,宁波的进出口波动较为剧烈。在2008年7月之前,宁波进出口同比增长速度高于全国、浙江省水平。在金融危机大规模爆发之后,宁波进出口下滑的速度也高于全国和浙江省水平。例如,全国、浙江省和宁波进口同比负增长最严重的月份都是2009年1月份,全国同比增长-43.1%,浙江省同比增长-36.8%,而宁波同比增长高达-50.1%;2009年1~6月,全国和浙江省出口同比增长分别为-21.8%、-19.6%,而宁波同比增长高达-22.9%,同期深圳、青岛、大连、厦门出口同比增长分别为-15.3%、-10.8%、-13.5%、-9.6%。

从贸易方式来看,与一般贸易相比,加工贸易受金融危机冲击程度更高,波动幅度更大。宁波出口贸易以一般贸易为主,一般贸易占到宁波出口额的3/4左右,加工贸易只占到总出口的20%多,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08年7月~2009年1月,宁波一般贸易同比下滑程度一直低于加工贸易;在2008年11月和12月加工贸易同比出现负增长的情况下,一般贸易仍然保持正增长的态势;一般贸易月度同比增长率只有两个月(2009年2月和8月)低于加工贸易;加工贸易的波动幅度更为显著,在出口下滑阶段,加工贸易下滑更为严重,占出口额的月度比重也在受冲击最严重的2009年1月下降到19.00%。

从市场分布看,宁波对亚洲、欧盟的出口受金融危机冲击较为严重,对北美洲市场冲击弱于平均水平。从累计增长率的波动程度来看,宁波的主要出口市场亚洲、北美洲、欧洲这三大洲,受到危机冲击时,亚洲市场下滑的速度最为显著,较好的为北美洲市场,欧洲市场处于两者之间。从占出口累计比重数据来看,2008年3月底,宁波对亚洲出口额占到全部出口额的32.57%,到2009年1月底和2009年3月底,对亚洲出口额下降到占全部出口额的27.26%和30.87%。2008年7月底,宁波对欧盟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为31.04%,到2009年的1月底和3月底,对欧盟出口占全部出口额的比重并没有明显变化,金融危机对欧盟市场的冲击位于平均水平。美国是宁波对外出口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国,危机期间宁波对美出口商品占总出口额的比重不但没有下降反而上升。

从企业结构看,外贸公司出口受金融危机冲击最为严重,其次为外资企业,自营进出口企业受冲击的程度相对较轻。在金融危机之前,宁波各类型企业出口的大致比重为4:2:4,即外贸公司出口大致占总出口额的40%左右,自营进出口企业出口占总出口额的20%左右,外资企业出口占到总出口额的40%左右。金融危机爆发后,宁波外贸公司出口受到较大冲击,在2008年7月,外贸公司出口为17.18亿美元,占到总出口额的39.11%,之后逐月回落,